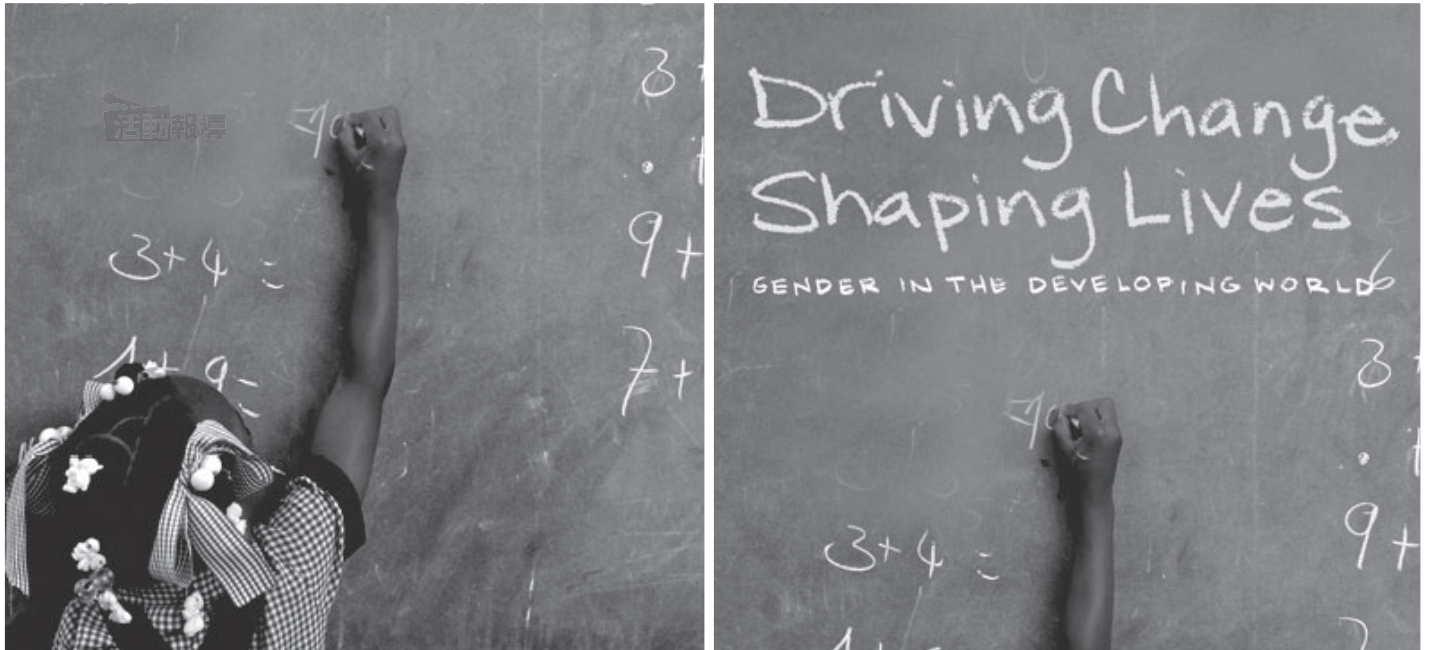




「推進改變、形塑生活：發展中世界的社會性別」國際研討會綜述

文 | 李琴¹ | 華中師範大學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

從2003年開始，哈佛大學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中心（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便發起和舉辦了囊括法律、藝術、食品、安全、宗教等各種各樣關於社會性別的講座和會議，而今年，由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中心和甘迺迪學院婦女與公共政策計畫（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at Harvard Kennedy School）聯合主辦的「推進改變、形塑生活：發展中世界的社會性別」研討會²於2011年3月3日至4日在哈佛大學舉行。這是社會性別研究領域在世界範圍內的一場頂尖的學術盛宴，匯集了來自亞洲、非洲、拉美等五洲百餘位專家學者和相關人士的廣泛參與，會議共設流動人口、健康、技術、教育和政治五個專場報告會。筆者將兩天的會議內容濃縮成制度設計、教育平等、技術安排、組織聯動、特殊事件、性別意識等六個主題，通過印度、阿曼、南非、盧旺達、巴基斯坦等個案得以呈現。作為參加本次研討會唯一的中國人，深感責任重大，迫不及待將會議精髓與華語性別研究社群分享。

1 湖北武漢人，2010-2011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富布耐特訪問學者。

2 會議的英文名為：Driving Change, Shaping Lives: Gend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本文的寫作得益於哈佛大學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Barbara J. Grosz 教授的大力支持，提供第一手的會議記錄供我參考，同時感謝麻省理工學院 Esther Duflo 教授的思路貢獻，尤其感謝 Brigham Young 大學 Valerie M. Hudson 教授提供的講稿，在此對其他發言者也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制度設計與女性參與：配額制在印度的實驗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 Esther Duflo 教授認為配額制、職位保留制和其他的政策都是增加女性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是制度設計促進女性參與的典型案例。她的發言思路清晰、分析嚴謹，內容包括配額制在印度的實驗、對女性參與的作用、對性別偏好的影響等。

對印度選舉制度有長期研究的 Duflo 教授針對配額制提出了不得不問的三個關鍵問題：第一，配額制對女性領導當選有推進作用嗎？第二，如果起作用，能有婦女期待的產出嗎？第三，配額制和類似的機制會對女性追求政治權力產生反作用力嗎？她指出，思考配額制產出的最好方法是細分情況：配額制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中是否有較長的歷史，這個國家是否產生了力求改變的推動力。以印度為例，增加婦女政治參與的動力始於二十年前的基層。印度從1993年開始實行非集權化體制（decentralization），在農村成立鄉村行政委員會（Panchayats）並授於村委會以決策權，這種鄉村行政委員會體制有著如下兩個強制政策：其一，三分之一的村委會成員席位保留給女性；其二，三分之一的村委會必須由女性作為首席負責人，即村主任。因為這種強制政策在村莊分步驟的逐漸鋪開，在有長達二十年強制政策的保障下，Duflo 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在研究中隨機抽選村莊的女性村

主任的比例都達到了預期的指標，所以分析配額制的產出視國情和政策而定。

在此基礎上，Duflo 教授的團隊試圖尋求以下四個問題的答案：第一，配額制促進了婦女參選嗎？第二，這些更多的參選婦女能有效地政治參與嗎？第三，她們的當選會使婦女需求的政策選擇有所改觀嗎？第四，配額制影響了女性政治參與的偏好嗎？她的研究發現：配額制促進了更多女性入選村委會，並且增加了20%的女性選民。通過其對印度村莊當選婦女幹部偏好的測量，發現女性村委會成員更關注於改善公路和飲水品質等生活必需品，對教育的關注偏好低於同僚的男性。在配額制實施之後村幹部受賄比例有所減少，並且總體而言公共物品的供給有所增加。但她指出，這種差異並不能顯示在公共物品的選擇上男性與女性孰優孰劣，而只能顯示領導席位上的性別偏好確實存在，領導在公共政策的選擇偏好上是有性別差異的。

鑒於一些村莊廢棄了第一個「三分之一」所要求的職位保留制，重新回到了不保留的選舉，Duflo 教授通過此兩種類型村莊的比較來研究職位保留制的影響，她發現：第一，從兩性比較而言，不管是通過職位保留制還是直接參選，女性領導席位的比例都有所提高；第二，當更多的婦女佔據領導席位時，政策的女性偏好也增強，即使女性離開領導席位，這種政策也未反彈；第三，

配額制對青少年教育和發展有長期影響，隨著女性進入實權領導席位比例的增加，父母雙方在教育子女的觀念和態度上有所改變，對女兒將來的發展有了更高的預期，也因為成功女性的典範作用，對這種預期有了更清晰的表達。

當被問及配額制在推動婦女的政治參與上還能走多久時，Duflo 教授提到目前在印度也有將保留席位推到50%的呼聲，她認為最好是要保持一定數量的職位，採取公平開放的政策，並不規定給男性或者女性，留給投票人自己去選擇。比如盧旺達婦女當選的比例遠遠高於配額制的要求，她相信這是基於盧旺達人民已經意識到女性有更多的財政可靠性（financially responsible），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說明男性和女性在治理品質上的不同，不能預測配額制還能走多久，但是將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排除於政界之外顯然是無效的；她不去追求改變態度、文化規範或者宗教信仰，她的目標是指出人們偏見和錯覺（misperceptions）的有害性。比如說，在印度，男性和女性皆認為女性不太能勝任領導職位，或者認為一旦女性離開配額制便無法當選，但是 Duflo 教授發現在印度，三分之一的村委會席位保留給女性，並且這些女性大致都能勝任保留性的職位，所以女性是具備治理能力的，需要的是通過制度設計使她們獲得展示的機會；當然，也確實存在領導職位的勝任力不足問題，以及依靠配額制

當選的事實，但這也正是印度的這些實驗所應引發的思考。

二、教育平等與女性發展：阿曼的探索

阿曼（Sultanate of Oman）Sultan Qaboos 大學教育系的主任 Thuwayba Al-Barwani 稱教育改革為「阿曼的社會推動器」，促進了低產婦死亡率、低離婚率和知識女性更高的生活預期。她說：「女性知道她們的權利依託於她們的能力和智慧。」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前的阿曼只有三種類型的學校，並且全部只對男性開放，阿曼婦女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前完全屬於私域，被視為文盲、愚昧的代名詞，並且仍對男性有著極大的依賴性。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後，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和她們的家庭成員追求海外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得到了語言訓練的同時，也培養了寬容、耐心、敏銳、追求發展等新的性格特徵。阿曼人擁有將國外思想和國內文化相容並包以提高生活水準的能力，同時，他們的蘇丹（部分阿拉伯國家對領導的稱呼）也努力推進男孩和女孩平等的受教權，指出就像一隻獨翼的鳥沒有辦法飛翔，沒有女性參與的社會也沒有辦法發展。

基於此背景，阿曼的女孩逐漸享有和男孩同等的受教育權，並且近年來在



左起分別為主持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教授 Asim Ijaz Khwaja、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 Esther Duflo、盧旺達國會議員 Aloisea Inyumba，以及巴基斯坦記者兼省議員 Humaira Awais Shahid RI '10（圖片 | 作者攝影、提供）。

以成績為基礎（merit-based）的教育系統下，女孩的大學入學率要高於男孩，因為總體來說，女孩在中學的資格考試上有著比男孩更為出色的表現，現今有些學校，為了確保性別平衡，甚至對男孩採取特殊的優惠政策或者以降低錄取線的方式幫助男孩入學。與中東其他國家相比，阿曼在婦女教育上所獲得的顯著成就得益於兩個重要的因素：一來，阿曼是海灣地區的領軍國家，經濟發展較好；二來，教育職位對女性教師的需求對女性發展提供了持續的激勵。舉例來說，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阿曼的所有學校都只雇傭女性教師，學生從五年級開始按性別分班，然後在大學階段才能重新回到男女同校的教室。受教育的女性仍然面臨經濟參與的挑戰，最新統計，阿曼女畢業生就業率僅為26%，但毋庸置疑的是，提升女孩的教育顯著的改變了女性的生活、促進了女性的發展。

三、技術進步與婦女解放：非洲的嘗試

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 Taryn Dinkelman 教授在其「家務中的電氣化」發言中指出，技術可以改變生活，但是發展中國家一些地區的人們還沒有進入電氣化時代，儘管也有環境的顧慮，但傳統燃料諸如木材、農作物殘渣等因為成本低仍被大範圍的用於家庭生產中，並且收集木材、農作物殘渣這類低效的耗時工作大多由婦女和女孩承擔。Dinkelman 教授介紹了在南非 KwaZulu-Natal 農村從1996年到2001年對當地470,000家庭免費提供電氣化的實驗，通過實驗發現，當地從傳統燃料轉向電氣化的趨勢明顯。但對於非洲其他地區，還停留在傳統的燃料時代，從某種程度上，電氣化的推廣程度依賴人們對電氣化花費的承受程度。

如果說電氣化有助於婦女身體的解放，那麼「Lifeline Energy」計畫則有助於婦女思想的解放。非營利組織「Lifeline Energy」旨在通過太陽能和風能提高弱勢群體生活水準，尤其關注資源獲取困難的貧困婦女和女孩，其創建人和執行長 Kristine Pearson 女士，通過研究團隊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大範圍考察，發現收音機是非洲傳播最廣的傳媒工具，於是從2003年至今捐贈了215,000台收音機，惠及千萬聽眾，這種收音機包括了MP3播放機、廣播電台、網路介面等功能，並且採取的是太

陽能和風能的自我充電，既環保又不會增加家庭的開支，通過收音機作為隨時隨地的教育和宣傳平台亦可增加女性的聯結和對話。新技術不僅為婦女節省時間，還為自給自足生活模式的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通過媒體的推廣，更為婦女思想解放提供了資訊來源。

四、組織聯動與婦女自助：婦女協會的推動

成立於1971年，旨在通過賦權婦女積極分子來促進社會變革的印度「自我僱傭婦女協會」（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由橫跨印度九個省的130萬名婦女組成，其中包括小販、大排檔、家政工、小物品生產者、工匠、服務員、農民等。這些非正式的經濟體為印度創造了60% 以上的GDP，然而50% 的非正式工作者依舊貧困（50% 的印度人處於官方的貧困線以下），女性則是最底層的貧困人群，她們不僅被排除在領導和決策層之外，還從事種植煙草等男性不願從事的工作，即使獨立工作也不能幫助女性擺脫貧困。而通過婦女自助、集中資金、合作經營，SEWA 推動了一百多家公司的成立，幫助零散的路邊攤小商販們免遭員警的驅趕之苦。

另外，非正式工作缺少諸如病假、產假等基本的社會保障。基於「無論我們賺多少錢，最後都要交給醫院」的感



左起分別為主持人哈佛醫學院副教授 Paula A. Johnson、馬拉威副總統 Joyce Banda、印度婦女自助協會（SEWA）工作者 Mirai Chatterjee，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全球環境衛生系教授 Kirk R. Smith。（圖片來源：Stephanie Mitchell/Harvard Staff Photographer）。

歎，一些婦女通過兩年的努力成立了 SEWA 健康合作社，傳播健康資訊、進行健康教育，提供醫療保險，確保諮詢服務等等，現在有接近1000名婦女加入了這個合作社。SEWA 社會安全專案的負責人 Mirai Chatterjee 說：「單獨的應對不公平和不平等是不可能的，通過集體或組織激發鬥志，獲得力量，得到鼓舞，由她們為自己呼籲，為自己吶喊，漸漸的，她們就開始為家庭、社區和更大層面社會的改變而鬥爭了。」

五、特殊事件與婦女參政：盧旺達的歷史轉折

論及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參政，不得不提盧旺達（the Republic of Rwanda），因為盧旺達國會的女性參政率高達56%，此比例居全球之首。來自盧旺達國會的 Inyumba 議員發表了關於盧旺達婦女政治

參與角色的發言，她指出發展中國家，尤其在非洲，女性仍然被剝奪教育准入權、決策權、公私領域的參與權、平等權利等。盧旺達在幫助婦女克服政治參與障礙上有其顯著的成功，其源自於盧旺達充滿戰爭、種族滅絕和歧視的慘痛的近代歷史。在1994年盧旺達經歷了一場殺戮百餘萬人民的浩劫，產生了五十餘萬的孤兒和顛覆社會原有結構的成百上千的職位調動。隨著這場暴行的結束，盧旺達人民切身體會到，政治要基於人民的最基本和最基礎的關注，而不是建立在歧視和仇恨之上。歷經浩劫之後的人民全力關注和諧、統一和未來發展，因為這種共識，他們知道如何繼承歷史、如何向前推進，因此才有了今天改變後的盧旺達。

在種族大屠殺之後的十五年裡（統計資料從1994年到2009年），婦女在新盧旺達的建設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國會中高達56%的女性保持著對腐敗的零容忍度（zero tolerance），並關注和平安全、經濟發展和婦女賦能，擔負著重建戰後國家、增進人權和復興的歷史使命。盧旺達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擁有如此致力國家未來發展且強而有力、堅定和誠懇的領導班子。

另外，Inyumba 表示盧旺達女性參政的高比例並不表示盧旺達的女性參與僅限於政治領域，盧旺達的婦女在私營部門也佔據了重要席位，婦女擁有占全國52%的中小企業，並且日漸延伸到傳統

工業中男性專屬的職業。女性參與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盧旺達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政治領域的成就給了盧旺達一個資訊，是一個開始。

偶然事件引發了盧旺達的劇變，底層和國家的雙重驅動器推動了親歷暴力衝突之後的發展，但維護既得成果還需要制度的保障。

六、性別意識與婦女權利：穆斯林婦女的困境

來自巴基斯坦的省議員 Humaira Wais Shahid 關注於社會性別意識對穆斯林婦女應對困境的重要性。她認為困境的改觀必須依託人們觀念的改變。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都決定性的影響著婦女權利和政治參與政策的有效性。

Shahid 議員以巴基斯坦國會「反對虐待女性決議」為例，此決議因偏離古蘭經的傳統解釋，遭到了宗教領袖和部分男性政府官員的強烈反對，這與伊斯蘭政治的近期歷史不無關係。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期，巴基斯坦處於反抗蘇聯入侵時期，武裝的激進分子設立了充滿暴力、反對女性的伊斯蘭教法（Sharia），另外，1977年上任的陸軍將軍 Zia ul-Haq 通過戒嚴令（martial law）實施了更加伊斯蘭化的法律，而這些都對女性權利有負作用。即使在今天的巴基斯坦政治領域，仍然體現著伊斯



蘭化，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嚴格的被政府所掌控，偽裝出一種對女性表面上的尊重和保護。以巴基斯坦的司法系統為例，其具有強烈的性別偏見，對性騷擾和性虐待缺少有責任的解決措施，受害女性常常要嫁給侵犯者以求保持她們的貞潔。巴基斯坦的婦女缺少決定自己婚姻的權利，她們不能沒有證據或理由而離婚，也缺乏繼承財產和掌控家庭經濟的權利；即使是寡婦，她們也沒有自主決定再婚的權利。總的來說，巴基斯坦婦女仍然處於「跟隨者」而不是「主導者」的角色。無獨有偶，阿曼的Al Barwani 教授在阿曼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女性仍然相信父親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並且相信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有著不同的性別角色，不認為她們對丈夫有約束的權利。此等種種都說明社會性別意識仍是穆斯林婦女追求平等權利首當其衝的阻礙。

結論

(一) 呼籲男性的擔當

發展中國家婦女的生活面臨著重重

挑戰，如何克服？據此兩天的會議，眾多發言者都坦言，除了婦女自身的推動之外，男性的支持必不可少。

在政治專場中來自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 Asim Ijaz Khwaja 教授作為專場主席，從觀眾眾多的提問中選擇了一個社會性別研究領域中反復提及的問題：社會性別研究不是女性的自說自話，男性的鼓勵和支持不可或缺，但我們如何讓更多的男性增進對社會性別的關注？如何有更多的男性加入這樣的會議？

發展中國家婦女賦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得到男性社會的支持和促進男性主導政府的改革。在技術專場，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Kirk Smith 教授研究燃燒固體燃料的爐灶對室內空氣的污染，並且揭示出每年有高達150萬的女性和兒童因此死亡。更新更安全的爐灶可以避免並顯著降低由此引發的死亡率，但是這些設備的購買都需要得到家庭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男性的認可和應許。

馬拉威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Malawi）的副主席 Joyce Banda 表示，她在降低產婦死亡率的政策進程中感受到了男性參與的力量。為了降低產婦死亡率，馬拉威政府採取的措施是呼籲農村婦女在臨產之際選擇在診所生產而不是傳統的在家生產，並且將村幹部（大多數為男性）作為「改革的推動者」，事實證明，正是有這些推動者使得在產婦健康這個政策上有了樂觀的產出。Banda

說：「一旦你說服了村幹部，你就贏得了整個社區。」筆者認為這不僅是男性的力量，更是權力的推動。

（二）聯動多方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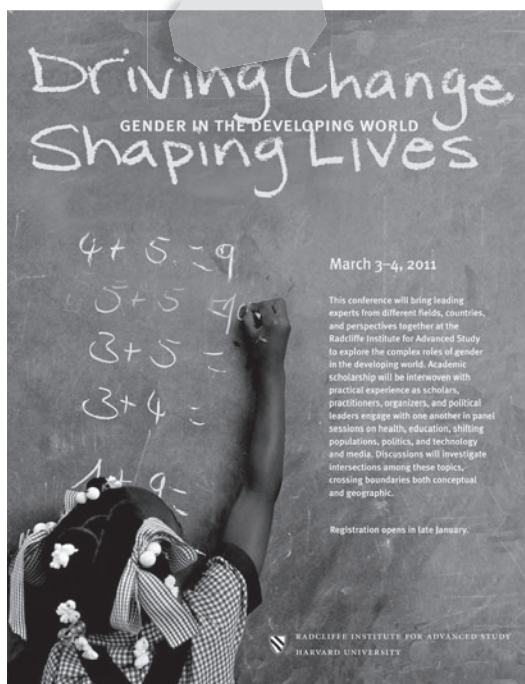
盧旺達的發展喚醒了女性參政作為未來國家的希望，女性的責任感也被視為盧旺達國會較為廉潔的可能因素。然而普遍來看，為何女性參政比例仍舊如此之低？Duflo 教授認為這不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問題是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認為男性更適合從政，所以我們需要催化器（catalyst）來創造思維的改變。而這種思維的改變需要聯動多方的力量。Duflo 教授從她個人在經濟發展研究上的經驗來解釋關於婦女政治參與的問題，在經濟領域，沒有單一的緩和貧困的良方，解決途徑是從教育的准入、健康到小額信貸的聯合政策。政治中的女性，是女性發展難題中的一支，也是為女性尋求更廣闊發展空間的一個關鍵，但不能被視為靈丹妙藥。學者的角色是加強成功政策的研究和宣傳，通過與領導者相互作用，以便促使更加科學、有效的政策進入到政治程式。概而論之，發展中國

家社會性別的發展，需要政治層面的制度設計，需要社會層面的組織聯動、教育層面的平等機會、科技層面的技術推動、社會性別意識的廣泛宣傳、特殊事件的激化推進，更重要的是各方力量的整合互動。

必須提及的是，對中國的研究，只有來自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政治學系的 Valerie M. Hudson 教授做的主題為「性別、人口統計、和平：女性安全和國家安全」（Sex, Demographics, and Peace: The Security of Women and the Security of States）的報告，在其研究中，她以中國計劃生育為例討論了新生兒性別比失調的問題，並且中國也只是 Hudson 教授眾多案例中的一個，

筆者有幸與主辦方交流，當問及為何中國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卻沒有來自中國的研究學者時，對方只能表示惋惜，中國社會性別研究還任重道遠！



▲ 本次會議宣傳海報（Dennis Thern, Star of Hope）。